

舆论、运动与外交

——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研究

周 斌 著

學苑出版社

舆论、运动与外交

——20 世纪 20 年代民间外交研究

周 斌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舆论、运动与外交：20 世纪 20 年代民间外交研究/
周斌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8

ISBN 978-7-5077-3622-9

I. ①舆… II. ①周… III. 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20 世纪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2899 号

出 版 人：孟 白

责任编辑：洪文雄

封面设计：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厂：河北三河友邦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960 1/16

印 张：14.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序

20 世纪 20 年代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外交从这时开始逐步走向争取废除晚清以来与列强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相关国家主权的新时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有什么变化?其外交活动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的?有何经验教训?给后人留下什么启示?此前的研究者虽然对此有些个案性的关注和考察,但要么忽略了公众舆论的多样性,要么仅仅强调其“革命”和“反帝”的意义,尽管也有学者涉及到民众反帝运动对政府外交的影响,却多为最终结果的描述,而对民众究竟怎样影响政府外交,二者之间经过一个怎样复杂的转化过程,则缺乏整体而深入的研究。

为弥补这些不足,周斌以近 10 年之力,撰写了本书。他从公众舆论和社会团体所从事的实际活动入手,长时段地考察了 20 年代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民间外交活动的概况及其与政府外交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若干以往研究者有所忽略,甚至完全忽略的理性的认识,主要有:

一、指出中共以革命手段“废约”的主张,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而是经历了一个与“修约”观念并存、此消彼长的过程。事实上,20 世纪 20 年代的公众舆论并非只有“废约”一种声音,还有试图按照国际法“修约”和调和于二者之间的多种主张,经过各种意见的交锋或者妥协,“修约”观念逐渐式微,“废约”观念才最终上升为民间外交的主流舆论。

二、指出民众反帝运动固然迫使列强各国渐进式地放弃了某些在华权益,但其自身也存在某些缺陷和不完善之处。比如,常因内部矛盾无法有效协调而难以持久。民众运动初起之时,各阶层民众尚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逐渐凸显,加上没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民众运动往往在列强与政府当局的压迫下很快便败下阵来。又如,不少参与民间外交活动者仅凭一时热情而对国情与外交常识缺乏必要的了解。他们不了解

当时的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强权世界中要取得对外交涉的成功,是有相当难度的,因而必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有效地结合起来,有时也须暂时舍弃某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交涉要求。又由于缺乏必要的外交知识,对外交涉运动中的情绪失控现象时有所见,常给列强造成扩大干涉、侵略的借口,因而也是必须力求避免的。这些缺陷和不完善,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众反帝运动对政府外交的影响力。

三、指出负有直接外交责任的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民众参与外交活动的反应,也并不纯属被动的“迫于民意而与列强交涉”,或简单的一味“镇压群众运动”,而常常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如五卅运动初起之时,北京段祺瑞执政府为应付奉系张作霖要求改造内阁的危机,就暗中支持过民众运动;济南惨案后,南京国民政府为抵制日本对其继续“北伐”的干扰,防范中共借反日运动扩大群众影响力,也曾暗中命各地党部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日运动给以必要的“指导”;而主持具体外交工作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王正廷等人则在反对民众以游行、示威等激烈运动形式干预政府外交的条件下对民意有所尊重;仅在民众外交活动失去利用价值,或超越其所允许的法律范围时,才会挥舞起无情的“镇压”大棒。当然,广大民众也不甘心仅为政府当局的利用工具。尽管民众外交运动初期,多数民众皆真诚希望“对外一致”,促成政府当局以民众运动为后盾,积极对外交涉,平等解决一切涉外案件,取消不平等条约,但当政府当局愈来愈背离民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意愿时,其矛头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向政府当局了。北京政府因不能担起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历史重任,最终淹没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之中,而南京国民政府也因同样的原因,不但遭到广大民众的反对,连国民党内部的改组派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敢或不愿与其为伍了,至于中共更是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其展开了长达10年的武装斗争。

上述认识,并不是作者随心所欲提出来的,而是在阅读170余种中、英、日文图书和报刊,尽可能详细占有、认真辨析史料,反复思考有关问题,了解事实的总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的合理结论,体现了作者不受社会诱惑,专心学术研究,不偷懒,不马虎,不取巧,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我对它的出版表示由衷祝贺。

曾业英

2010年6月8日

前 言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时期，有学者指出：“它既是民国政治由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转换到国民党掌控的南京政府的转折时期，又是国共两党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运动及北伐战争到最终破裂走向内战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时期。”^① 不仅如此，20 年代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王建朗先生认为，“近代中国外交的崛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外交终于走出近代 80 年来沉沦和低迷状态，逐步向列强争取收回中国过去所丢失的国权。^② 其中原因，就国际背景而言，一战后随着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包含外交公开、民族自决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列宁颁布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兼并政策与秘密外交的《和平法令》，西方各国要求外交民主化、摒弃传统的秘密外交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英、美等列强不再像过去那样凭借武力大肆侵略扩张，而越来越注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从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外交的出现提供了比过去略微宽松的外部条件。就中国国内因素而言，除了顾维钧、王正廷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职业外交官勇于并善于同西方列强打交道之外，清末已萌芽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经中华民国的建立、新文化运动的刺激蓬勃发展，并成功地筑就了促使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的五四运动，而广大民众从中看到了自己对外交的影响力，增强了外交参与的自信心，进而掀起了“反帝废约”的

^① 《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1920 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②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43 页。

一次又一次高潮，也迫使列强不得不渐进地放弃部分在华特权和利益。因此，时人有五四运动为“国民外交时期”的开端之说。^① 鉴于史学界对20年代北京政府的外交状况与列强的对华政策已有较多研究，而对民众的外交参与关注较少，笔者拟以20年代的民间外交观念及其实践活动为本书的考察对象，力图展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外交认知水平，总结经验教训，揭示民间外交由感性到理性、趋向成熟的客观规律，既可以深化外交史、民众运动史的研究，且对当今中国外交有着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民间外交”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外交”一词的定义，众说纷纭。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将外交理解为一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官方对外活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外交行为者被限制在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如英国学者欧内斯特·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② 中国学者鲁毅也认为：“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③ 金正昆更是明确说道：“在正式的外交场合里，打交道的只是国家与国家、一国政府与另外一国政府。其他类型的交往，例如个人、群众团体或群众组织等等以其自身身份所进行的一切对外交往，都不能够被列入外交的范畴之内。”^④ 的确，“严格意义上的外交行为主体是主权国家”^⑤，只有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才真正具有外交行为能力，具有对外行使主权的相应权利并能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在具体的外交实践当中，广大的民众并非听任政府对外交涉、谈判、订约，左右民族利益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通过舆论、运动或出访等方式参与外交，力图将自己的意志体现于政府

① 胡愈之：《国民外交与国际时事研究》，《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1926年1月10日。

② [英] 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③ 鲁毅等著：《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④ 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⑤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4页。

的外交之中。如果将他们完全置于外交行为主体或外交行为者之外，似有失公允。

早在 19 世纪末，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就抨击由少数君主、政客把持的秘密外交，呼吁人们以舆论监督外交或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一战爆发后，这种呼声达到了一个高潮，所谓“外交的民主监督”（democratic control of diplomacy）、“民主外交”（democratic diplomacy）、“外交政策的公众监督”（popular control of foreign policy）等语汇也流行开来。^①人们开始频频介入外交领域，对外交的影响也日渐增大。1940 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贝利出版了《美国人民外交史》一书，认为美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公众舆论决定国家基本的外交政策，总统与政府是这些政策的执行者，体现了人民的要求。^②该书至 1980 年发行第 10 版，在英、美等国颇受欢迎。它虽有为美国对外政策作辩护之嫌，但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即一国民众对外交的意见已成为该国政府制定、执行对外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

如今西方国家多将民间人士或团体的外交参与称作“citizen diplomacy”或“track two diplomacy”（第二轨道外交），以区别于各国政府之间的“track one diplomacy”（第一轨道外交）。^③而且，自 1960 年代以来，美国等国又兴起了“public diplomacy”（公共外交）一语，其主要意思是指一国政府主办的，通过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电台和电视等工具引导或影响他国舆论的项目，以使该国公众理解和支持本国的对外政策和行动。^④这说明一国政府的外交对象已不再局限于他国政府，已扩展至他国人民。有学者甚至认为，“公共外交”的实施者不仅是一国政府，除了政府对他国公众舆论的培植之外，还包括一个国家的民间团体或利益集团与

① M. S. Anderson, *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 1450—1919,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3, p. 142; Arthur Bullard, “Democracy and Diplomacy”, *Atlantic Monthly*, Vol. 19, Jan.-June, 1917, p. 491-499.

② [美]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Thomas A.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New York, Seventh Edition, p. 1-3.

③ 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ck_II_diplomacy, http://en.wikipedia.org/wiki/Citizen_diplomacy; 以及 http://www.beyondintractability.org/essay/track2_diplomacy/, Diana Chigas, “Track II (Citizen) Diplomacy”, August 2003.

④ 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iplomacy.

其他国家的民间团体或利益集团的往来，跨国文化交流等。^① 总而言之，当今世界“国家已经不是国际舞台上的惟一主体了”，“非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大众运动等超国家主体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使得国家以往发挥的绝对作用大大减弱”。^② 从广义上说，外交行为主体或行为者实际上已不限于国家之间交往的传统外交范围，而具有多元化的特征。

在中国，从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人们多使用“国民外交”一词来表达参与外交的愿望，并对它的定义、方式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1）1920年《民心周报》指出：“以今日世界德漠克拉西 democracy 之潮流，各国外交政策莫不以人民公意为基础，所谓国民外交者是也。”^③（2）1928年4月，《醒狮周报》援引日本国际法专家信夫淳平对“国民外交”解释，认为它包含两种意义：一是斟酌民众的思潮，政府代表民众对外的自觉去办外交事业；二是民众离开政府的形式外交，与他国的民众披露诚意、交换意见，疏通彼此的思想，因此寄与国交的亲善。^④（3）1928年10月，留法学者陈耀东出版《国民外交常识》一书，将“国民外交”区分为柔性的和刚性的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一国国民与他国国民间的一种交际，或是联络感情，或是交换意见，以使两国国民间的感情日趋融洽”。后者是说“全部的国民应当严密地组织起来，施以训练，积极地辅佐政府外抗强权，以求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遇事机急迫时，亦得单独的对外表示”，其运用方式包括国际宣传、示威运动、对敌经济绝交、对敌不合作、武装民众实行作战等。^⑤（4）1930年国际法专家周鲠生在武汉大学演讲“外交的民主化”，表示：“所谓的国民外交，当然不是说由国民自己处理外交，国民外交的主旨只在使一国的外交政策受国民直接的或间接的（经由国民代表机关）的支配。简单地说，现代政治所要求的是外交的民主化。”他主张“真正要国会能在外交上行使有效

① “What is Public Diplomacy?” <http://www.publicdiplomacy.org/1.htm>, Sept. 1, 2002.

② [日] 星野昭吉著、刘小林等译：《变动中的世界政治——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沉思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2页。

③ 峙冰：《国际联盟与国民》，《民心周报》第1卷第11期，1920年2月14日。

④ 天然：《论国民外交》，《醒狮周报》第183期，1928年4月14日；信夫淳平：《外政监督と外交機關》，日本評論社1926年版，第51页。

⑤ 陈耀东：《国民外交常识》，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244-245、259-264页。

之监督”。^① (5) 1931年出版的《辞源》提出：“国民对于外交当局处于监视地位，常造成健全之舆论督促之；当局者因以国民之利害休戚为标准，而定其外交方针，是为国民外交。”^② (6) 1937年由东北大学教授王卓然、刘达人主编的《外交大辞典》指出：“以国民舆论或权能，监督并督促外交当局，使外交方针与国民意志一致，是谓之国民外交。”其中的“权能”主要是通过宪法或行政的限制，使宣战、讲和、缔约等重大外交事件经过种种慎重手续，“以国民大势为依归而决定之”。^③

简而言之，建国前“国民外交”的含义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类似西方外交民主化的思想，视外交为国民的外交，政府应尊重民意办理外交，而国民可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以舆论监督外交，将自己的意志反映贯彻于外交事务；二是通过国际民间交往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以增进友谊，改善邦交；三是类似民族主义运动的概念，通过示威、经济绝交甚至“武装民众实行作战”等民众运动方式援助政府外抗强权，或做“单独的对外表示”，以实现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外交”一词除在台湾继续使用外，在大陆则渐被“民间外交”一词所取代。不过，它们一般是指“各国民间人士或民间机构之间有利于各自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具有非官方性质的国际交往”^④，有时也“泛指各国人民间的一切友好往来活动”^⑤，“举凡学人聚会，艺术展览，体育比赛，戏剧音乐之演奏，乃至观光览胜，佳丽斗妍，无一不可纳入国民外交之范畴”。^⑥而较少提及建国前“国民外交”中第一、三方面的含义。其中原因，或与中华民族已获独立，“监督政府行政

① 周鲠生：《外交的民主化》（1930年12月2日），《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3号，第629-631页。

② 方毅、傅运森主编：《辞源》续编丙种，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丑60。

③ 外交学会：《外交大辞典》，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733页。

④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3页。

⑤ 刘志遥：《“民间外交”之我见》，《世界知识》1987年第4期。

⑥ 黄宝实：《中国历代行人考》续编，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382页。转引自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会时期的国民外交》，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的机制之形成”以及现代“外交”定义的多元化有一定关系。^①但即便如此，仍不容忽视原来“国民外交”概念中“政府应尊重民意办理外交，国民有权监督政府外交”的现实借鉴意义。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译自美国“public diplomacy”一语的“公众外交”或“公共外交”的新词。与国外“公众外交”旨在引导或影响他国舆论的外向性相比，中国的“公众外交”具有鲜明的内向维度，其对象多是本国的人民，“一方面通过交流、介绍外交政策，引导公众理性思考外交问题，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智慧、观点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一种启示、促进，甚至是监督”。^②这与过去“国民外交”所谓政府外交须尊重民意，国民应监督政府外交的意思是相通的。2004年，外交部新闻司设立“公众外交处”，后又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旨在通过外交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让公众理解本国的外交政策，并集中民间的智慧为外交服务。鉴于此，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平民百姓更应主动地关注和参与外交，贡献自己对外交的真知灼见。而今天的“民间外交”概念不应该仅指向对国家外交有影响的国际民间交往，似应恢复过去“国民外交”含义中国民通过舆论等方式参与政府外交的层面。

笔者认为，“民间外交”是指相对于政府外交而言的，民间人士或团体通过舆论、运动及出访等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以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及国际关系的活动。^③根据该定义，本书将讨论20世纪20年代民间的外交舆论，民间力争收回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对外运动，以及走出国门或借商业考察之机，或参加国际会议，宣传民众自身的外交主张，以影响政府外交和外国对华政策等方面，力图全面揭示20年代社会

① 台湾学者廖敏淑认为，或许是因为现代“外交”定义的多元化以及“监督政府行政的机制之形成”，使得现代人很少把国民外交活动与“监督政府外交政策”联想在一起。（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会时期的国民外交》，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272页。）

② 葛军：《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外交》，《世界知识》2005年第10期。

③ 该定义参考了复旦大学教授王立诚对近代国民外交含义的描述，王先生指出：“国民外交，是国民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参与，是指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来表现自己的意志和实力，从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左右对外关系的趋向。”（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168页。）笔者认为王先生忽略了近代国民外交含义中旨在改善邦交的国际民间交往的层面，且用“趋向”一词不妥，应予补正。

各阶层的外交认知水平与实践经验。

二、文献综述

从外交行为主体的角度而言,目前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如旨在推翻现政权且相继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共产党的外交),以及个人如郭嵩焘、孙中山、顾维钧、王正廷等人的外交思想与活动等,而对民众外交参与的研究相对要薄弱一些。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陆学者虽对近代史上的民众对外运动有所关注,但往往强调它们的“革命”与“反帝”意义,尽管也谈及了反帝运动的外交影响,却多为结果的描述,而对民众究竟怎样影响外交,其中间环节是什么等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大约至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注意近代史上曾风云一时的“国民外交”现象,并发表了若干研究成果。如王立诚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一书中简要介绍了晚清国民外交兴起的经过^①,虞和平先生在其所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中提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工商界在中外实业团互访活动中产生的“国民外交”或“商人外交”的观念^②,幕亚平、马新民等人阐述了国际法专家周鲠生对国民外交的言论等。^③

进入21世纪后,相对政府外交而言的近代民间外交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如以商会为依托的商人外交、社会团体的非政府外交、社会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等,都有专题研究面世。”^④首先,“以商会为依托的商人外交”为例,虞和平在《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一文中,对五四运动前后商人外交活动的进步、商人外交意识的强化、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等作了精彩的论述。^⑤许冠亨的博士论文《20世纪早期中国商会与外交》探讨了1902至1926年间中国商会与外交的互动关系,包括商会在中外商

① 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168页。

②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③ 幕亚平、马新民:《试论周鲠生的国民外交理论》,《法学评论》1990年第5期。

④ 王建朗:《究中外之际通中西之变: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扫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8月19日。

⑤ 虞和平:《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约谈判、反对《华工禁约》、收回利权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及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等。^① 贾中福的专著《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则以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为切入点，考察了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与合作、中国商人参加1922年太平洋商务会议的言行以及中美商人围绕1923年中国商标法的对话等。^② 以上3位学者的论著，展现了近代中国商人维护国权、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面貌，深化了人们对近代民众外交参与的认识。不过，商人毕竟只是社会各阶层的一分子，而民意对政府外交的影响往往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某些具体的外交事件而言，考察包括商人在内的各阶层参与外交的方式、特点与历史作用等，似更有意义。

其次，就“社会团体的非政府外交”而言，许冠亭、张静、张万杰等学者分别论述了五四前后的国民外交协会、1925至1933年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29至1931年的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的组织构成、外交主张及社会反响等。^③ 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国力贫弱的近代中国，人们往往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监督政府外交或参加民间国际会议、宣传中国人民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由的主张等。通过对民间外交团体的个案分析，可以较好地反映某些社会群体参与外交的不同面相。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曾在民众对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民间外交团体，如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1923年收回旅大运动中的国民对日外交大会、济南惨案后的反日会等还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亟待深入。

第三，就“社会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来说，中国台湾学者应俊豪已出版的硕士论文《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通过分析和会前后“反日”舆论与北京政府派系斗争、拒签和约

① 许冠亭：《20世纪早期中国商会与外交》，苏州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

② 贾中福：《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许冠亭：《“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张静：《中国知识界与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张万杰：《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外交活动述评》，《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等问题的关系，归纳出五四时期外交与舆论互动的两种模式：一是“内部战线”，即有心人士利用国内高涨的“反日”舆情，伺机藉由适当的“对日”外交事件，鼓动人心，攻击国内的敌对势力；二是“外部战线”，即负责实际外交折冲的外交官员，为因应弱势外交困境，援引国内舆论力量，以为外交之助。^① 应俊豪的“两种模式”论，将过去易被人忽略的“借外交事件以为内争之用”的现象曝光，有助于人们全面认清近代外交与舆论的互动关系。大陆学者冯筱才在《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的执政府》一文中，也谈到了段祺瑞执政府在沪案交涉初期有意识地利用民众运动，迎合舆论，既迫使外人让步，又挟民意对抗强势军人的情况，认为“五卅运动实际上成了执政府运用的一种政治工具”。^② 杨红林则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例，指出：以工商阶层及知识分子为核心的要求关税完全自主的舆论，对北京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也提供了一定支持，但由于地方军阀及南方国民党等因素的干扰，最终关会休会，难以实现他们的外交诉求。他认为，舆论只能从侧面对政府外交发挥作用，而真正足以从根本上触动北京政府外交的，应该是舆论背后的政治力量。^③ 这些研究成果均强调舆论与外交互动过程中的内政因素，注重政府层面对舆论的反应，对笔者如何客观评价 20 年代舆论对政府外交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舆论是各种意见的集合，这种集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往往是交锋或者妥协的结果。如果不充分了解舆论的多样化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不了解舆论对政府外交的动态反应过程，也就难以理解“反帝废约”何以成为 20 年代民间外交舆论的主流。

此外，有的学者对清末民初各阶层、各社会力量参与外交的活动情况做了不同程度的综合性考察。例如，顾莹惠的《论 20 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一文，探讨了 20 世纪清政府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流亡海外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由实业家组成的商会力量的外

① 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2001 年版，第 249-256 页。

② 冯筱才：《沪案交涉、五卅运动与一九二五的执政府》，《历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③ 杨红林：《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2 期。

交活动。^① 廖敏淑的《清末到巴黎和会时期的国民外交》一文，重点论述了巴黎和会期间在野名流的欧洲考察风潮、民间外交团体的组成与活动、新闻界对和会的采访报道与外交关心，以及最后由五四运动引发的全国性国民外交运动等。^② 印少云的专著《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研究》则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清末民初国民外交运动产生的背景、发展的经过和特点，并对商人、以学生为主的知识界和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下层民众在国民外交运动中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有益的探讨。^③ 但是，由于该书的研究对象为1900至1927年“旨在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民众运动”，涉及面较广，作者基本上采取的是宏观的归纳比较方法，而较少针对某一具体外交事件而起的民众运动进行细致的个案分析，因此忽略了民众运动如何影响政府外交的诸多细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观念及其实践活动这一课题的研究，有许多领域亟待开发，即使是前人已论及的问题，因为历史材料未充分挖掘而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其中，除了前文所述对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反日会等民间外交团体以及多样化的民间外交舆论的研究不够深入之外，还没有学者将20年代作为一个长时段专门研究民间外交观念从“修约”转向“废约”乃至“革命外交”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对20年代中外关系曾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就本课题的背景知识而言，现有关于清末民初国民外交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实践方面的探讨，虽谈到了“国民外交”一词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但由于未使用相关的英、日文资料和一些原始的中文报刊文献，而忽略了该词可能转译自日本以及它与英、美等国外交民主化思想的关系，进而对该时期国民外交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发展的，有什么样的具体内容等问题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厘清此背景知识，补正人们对清末民初“国民外交”概念的认识，也是笔者选择本课题研究的原因之一。

① 顾莹惠：《论20世纪初的中国国民外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② 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会时期的国民外交》，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272页。

③ 印少云：《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三、本书的篇章结构

本书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详细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力图对 20 世纪 20 年代民间外交观念及其实践活动作一系统而深入的探讨。鉴于 20 年代的民间外交丰富多彩,难以全面地还原其历史面貌,本书将以前人研究较少、具有典型意义的民间团体的外交活动和公众的外交舆论为基础,从四个方面展现 20 年代民间外交的发展状态。第一,在简要回顾清末至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外交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后,考察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发展与体会过程,揭示其成员对华盛顿会议从希望到失望的心态。接着探讨国人在 1923 年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运动中由对日经济绝交到经济援助的态度变化。从运动一开始,国人就声明对日经济绝交针对的是执意侵华政策的日本政府,希望日本人民督促其政府改善中日关系。而当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后,国人却积极提供经济援助,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挚友谊。第二,以五卅运动前后北京、上海两地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为中心,比较社会各阶层对于沪案交涉、“废约”及“修约”的看法和意见,揭示“反帝废约”逐渐成为主流舆论的趋向,并探讨它们对于北京政府对外交涉的影响。第三,论述北伐战争时期和济南惨案后民间的“革命外交”观念及其实践特点。北伐期间,国人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观念充分付诸实践,既促使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却又出现了某些过激行为,如伤害了一些在华外国侨民、传教士的生命财产等,在一定程度上给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带来被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间的“革命外交”观念进一步发展,其突出表现是:济南惨案发生后,民众积极开展反日运动,成立全国反日会,要求南京政府确定“革命外交”的对外方针,恢复民众运动,公正解决济南惨案及废除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等。第四,聚焦 20 年代民间的外交出访,重点考察 1926 年中国实业代表团赴日访问,及民间人士参加亚细亚民族会议的情况,包括他们与外国人士唇枪舌剑,宣传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独立自由的主张,表达增进中外人民间友谊的良好愿望等。

通过上述的考察、分析，笔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有：国人参与外交的自主意识是如何增强的？社会各阶层的外交观念和活动方式有何区别？在“修约”与“废约”问题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后者，排斥西方的国际关系准则？20年代民间外交对中外关系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其经验教训是什么？等等。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肯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